

与武汉乘客同机：双方的困境

原创 薛芃 三联生活周刊 3天前



2020年1月29日上午9点41分，“杭州发布”通报，1月28日杭州新增确诊人数19名，其中有2名，正是来自1月24日新加坡酷航的TR188航班。

该航班1月24日从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往杭州萧山机场，当航班抵达的第二天，就已确诊2名新冠肺炎患者，现在，这个数字上升至4名。机上335名乘客中，有116人原本飞往武汉，但由于武汉航班取消，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他航班回国，杭州成了他们集体选择的目的地。

一边是非武汉乘客本能的不安与担忧，另一边是武汉人害怕成为病源的忐忑与回国心切，在两难的抉择面前，谁来保护他们各自的权益？

记者 | 薛芃 驳静

“杭州的先下”

1月24日下午，戴永新一家三口很早就到了樟宜机场，没能买到口罩。远在杭州的大儿子头一天就告诉他，“最好买一点口罩”，他在酒店附近的大商场和几家“7-11”都没能买到。他们一家三口，直到飞机降落后，才从防疫人员手中领到口罩。与4位确诊患者共乘一机的他们，全程没有防护，对于能否顺利解除隔离，戴永新心中忐忑。

同样忐忑的还有徐可与父母。他回想起来，新加坡机场的安检“形同虚设”，尤其是没有测量体温，似乎对当前的疫情显得漫不经心。

原本这架航班上有4个团，其他都是散客。其中的赵女士留意到，酷航更改过一次飞机型号，她后来怀疑，“是为了增加武汉改签杭州的116名乘客临时换的”。得知武汉肺炎疫情后，新加坡酷航决定取消1月23日到2月2日期间所有飞往武汉的航班，原本这些航班的乘客可全额退款或自愿选择酷航其他航班，飞往大陆其他城市及港、澳地区，或将机票无限延期。

徐可一家是登机比较晚的一拨人，坐在飞机的后排。此时，前面的位子已基本坐满。

5个小时后，飞机于1月24日晚上9点半落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

一看表，比计划早了15分钟。机舱广播让乘客暂缓行动，按住了部分飞机一停稳就拿取行李的乘客。十几分钟后，上来2位身穿防护服的人。



波音787是宽型客机，有2个通道，2名防疫人员从通道一头开始分发“健康申报卡”。戴永新一家三口的座位在飞机中间一排，发到他们的时候，他问，“为什么不让空姐一起发”，他以平常国际航班乘务员发放入境卡为经验，想不明白为何发表格不能发得高效一点。他得到的回答是，“你不要管”。

跟经验老道的戴永新相比，徐可则“老实”得多，21岁还在读大学的他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感到新鲜。他以为，这些都是航空公司和机场检疫在非常时期的常规程序，和大多数旅客一样，填完表后，耐心地待着等出舱。

从发表格到最终放行，大概花去一个半小时。飞机广播终于通知，“武汉乘客或最近去过武汉的乘客原地不动，其他乘客有序下机”。

徐可坐在最后一个机舱，他跟着人流一点一点往前舱门移动，越往前走，他发现坐着的人越多，他本以为这些乘客只是不愿挤，但从他们身边路过时，低头瞥见，他们表格中“出境地”一栏，填的都是“武汉”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意识到整架飞机约有三分之一的座位，都坐着武汉人，远比猜测中多得多。

那一瞬间，徐可心态有点崩了，本能地开始感到恐惧。1月25日这天，新型冠状肺炎通报的全国确诊病例达1975人，其它国家也陆续有诊症病例传出。人虽在“新马”，心思却被每天手机里的信息牵住，这么多“武汉出境者”，更使一家人感到不安。

徐可没想到，在回家的最后一道关卡上，他们和一百多位武汉人共同处在一个密闭空间里，长达7小时。“当时我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，但已经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。我自己倒还好，就是担心爸妈，不是说好多被传染的都是中老年吗？”

机场除夕夜

等他们到机场大厅，离飞机落地有1个多小时。

戴永新在饮水机处，碰到飞机上服务他们那几排的空乘小姐——11名机组人员，将与219名乘客一起被隔离。戴永新回想起，飞行期间，这位空乘曾试图为他们一家三口调换位置，但后来又放弃了。他于是上前问她，“是不是我们边上有武汉乘客”。这位空乘员长得很好看，也是杭州人，不过对她老乡提出的问题，给了一个以模棱两可的答案。



受访者供图

戴永新最后一次看到“武汉人”，就在到达机场大厅后不久。他本以为，下了飞机后，就没有机会与他们再有交集，没想到又看到了，是两位姑娘。她们出现在视野中时，左右各有3名“护法”，将二人护在中间。赵女士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她觉得这两位姑娘是“二十出头”，“围着她们的起码有4个人”。他们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，一行人出现时挺引人注目，朝机场洗手间走去。



这之后，飞机上的“武汉人”和“非武汉人”彻底分开。原本飞往武汉的116名乘客被带到了更封闭的地方，进行更细致的隔离检查。凌晨3点左右，来了一位工作人员，告诉大家说，116名乘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“其中7位有异常”。

原本落地杭州的219名乘客，整个晚上都待在T3国际航站楼的一楼大厅里。越到夜里越冷，这些刚从热带国家回国的人也没带够衣服，徐可和父母把所有能穿能披的都套上，再加上机场发的毯子，可还是不够，就这么捱到了早上。

上午10点左右，杭州市“冠状病毒肺炎”防控指挥部发布官方消息，称“飞机着陆后，2名发烧人员将送至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，其余武汉乘客在机场宾馆就地隔离，219名其他乘客在市委党校集中医学观察”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是国家三乙医院，也是距离机场最近的一家综合性医院。



受访

者供图

戴永新听他儿子在网上刷到这条消息，不久，才得到工作人员的现场确认，来者说，先把大家送到宾馆去，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家。

在机场度过不眠之夜的这219位乘客，终于可以前往下一站，正如公告所说，他们果真将前往杭州市委党校。按戴永新的观察，车队浩荡有七八辆车之多，5辆大巴，另有领队警车，每两辆大巴中间，又有警车做间隔。约一个多小时后，他们到达目的地。此时，已经是1月25日中午，离他们落地萧山机场超过12个小时。

这不安的一夜，也恰是除夕夜。

隔离开始

杭州市委党校宾馆的条件不错，一人住一个标间，每天有送餐机器人定点送饭，需要任何生活必需品，在专门组建的微信群里发言，就有专人帮忙去买，包括大衣、外套。因为天冷，隔离观察又不能开热暖气，因此每人还会分到一个热水袋来取暖。被隔离的乘客和空乘人员要做的，就是每天定点测体温，上午9点半、下午3点各一次，确保身体没有不适。其他的大把时间都属于自己，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网络。

在萧山机场附近宾馆隔离的其余武汉乘客，也过着相似的生活，这样持续14天，其间不与任何人接触，除非感到身体不对劲要看医生。

被隔离的第一天晚上，徐可发了低烧。他没有惊慌，很平静，因为在走出舱门时，他就预想到了这一刻的到来。徐可很快在微信群里联系了医生，体温37.8度，没有其他特殊症状，与冠状新型肺炎表征很大的差别是，徐可的喉咙发炎了，医生推测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。徐可想想也是，毕竟前一晚在机场冻得够呛。



受访者

供图

虽然徐可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母亲知道儿子发烧时，一下就哭了。一家三口的房间互相挨着，却见不到面，每天只能靠视频聊天，这一堵墙隔得好像有几千公里远似的。

219名乘客里有不少孩子。赵女士的女儿才6岁，得以跟她住在同一个房间。漫漫14天，她哄女儿的方式是告诉她，“妈妈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度假，咱们做一个游戏，在这里住半个月”。

第二天，女儿就说想回家，赵女士只能继续她善意的谎言：“还不行，要半个月，游戏咱们不能输”。

如果事先得知真相，她认为自己会选择“下飞机，只要舱门还没关”。隔离期间，她咨询了律师朋友，得到的解释是，航空公司对乘客有“安全保障义务”和“告知义务”。另一个她想不通的点在于，两批乘客即便上了同一趟飞机，为何将大家交叉混坐，而不是区隔开来？不过就像赵女士所假设，倘若真的被事先告知，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愿意继续搭乘这趟航班？这是个未知数。

两种困境

酷航不是唯一做此选择的航空公司。

1月25日，马来西亚飞往天津的OD688航班上，有31名武汉乘客。北京人高珊告诉记者，飞机一降落，她就看到地面有十来名身着防护服的人，他们上飞机后，乘客才得知，同机原来武汉乘客，其中1位有发烧情况。

在飞机上等待4个小时后，后排一位年长男性乘客被率先带离飞机，高珊注意到，即便此时，他也没有戴口罩，也没有被防疫工作人员要求做其它防护措施。被安排在最后几排的这31名武汉乘客，也只有部分佩戴口罩。

第2天，高珊从网上得知，这位发热病人就被确诊了，并且“为重症病例”。1月27日，此31名武汉乘客又新增一例确证患者。也就是这天，微信群中的工作人员才松口说，“不出意外，需要隔离14天”。至今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所处何地。高珊从手机地图上揣测，他们应当是被隔离在天津手电筒厂厂区的一处招待所中。

同是1月25日，又有3架载有本应飞往武汉的乘客的国际航班，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，分别是AK1574、CA734、MF8642，从马来西亚沙巴、泰国曼谷和日本大阪飞来，3个航班上共25

名武汉人，其中有1名发热病人。第二天同一时间大阪飞杭州的航班，又延续了这种情况。



图片来自微博网友@巧克力乌龟

机上乘客经历大抵相同，打算返回武汉的乘客发现航班取消，不得已改签，落地或医治或隔离；而非武汉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上了飞机，落地后才知道自己在刚才的几个小时中并不安全。

夹在他们中间是航空公司，航空公司是否应该将两拨乘客安排在同一班客机上？同乘一架飞机，是否应当做起码的区隔？是否应当尽到“告知义务”？是否应当发放口罩及提供其它防护措施？上述航班的乘客都提出了这些疑问。

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如何保障武汉人的利益。

1月27日，南航CZ380由日本名古屋飞往上海，上海乘客觉察到同机有武汉乘客后，向机场反应，不愿与他们同乘一架飞机。最终，武汉乘客得以单独飞回上海，接受检查与医治。





对遭遇“嫌弃”的武汉乘客来说，封城后有家难回，何尝不是艰难的困境。这种困境既来自同胞的排斥，也来自部分航空公司“不接受湖北旅客”的措施，疫情当前，留给武汉乘客的选择并不多。作为运送乘客的一线，如何兼顾湖北与非湖北乘客的利益，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是个挑战。

在“善待武汉人”的口号中，当身边真的出现武汉人时，能否真的如倡议般善待，又该如何切实地既帮助他们又保护自己？在疫情面前，人与人之间相互防备的界线究竟该如何把控？病疫边界和人道关怀又该如何平衡？面对即将到来的“返工潮”，这既是对个人，也是对社会提出的更大难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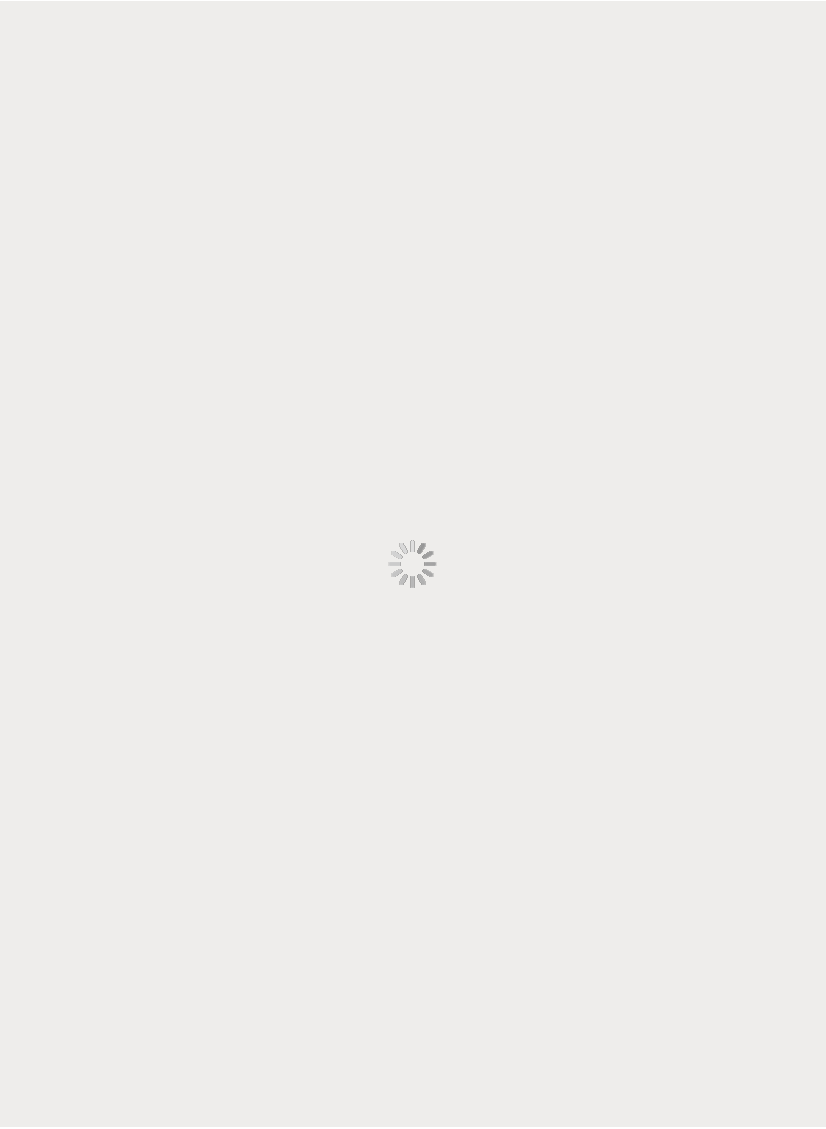
(戴永新、徐可、高珊为化名，实习记者张佳婧对本文亦有帮助)

作者档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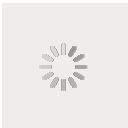


薛芃

上海、浙江地区疫情一线人员及社区防疫工作者，欢迎与我联系。



26分钟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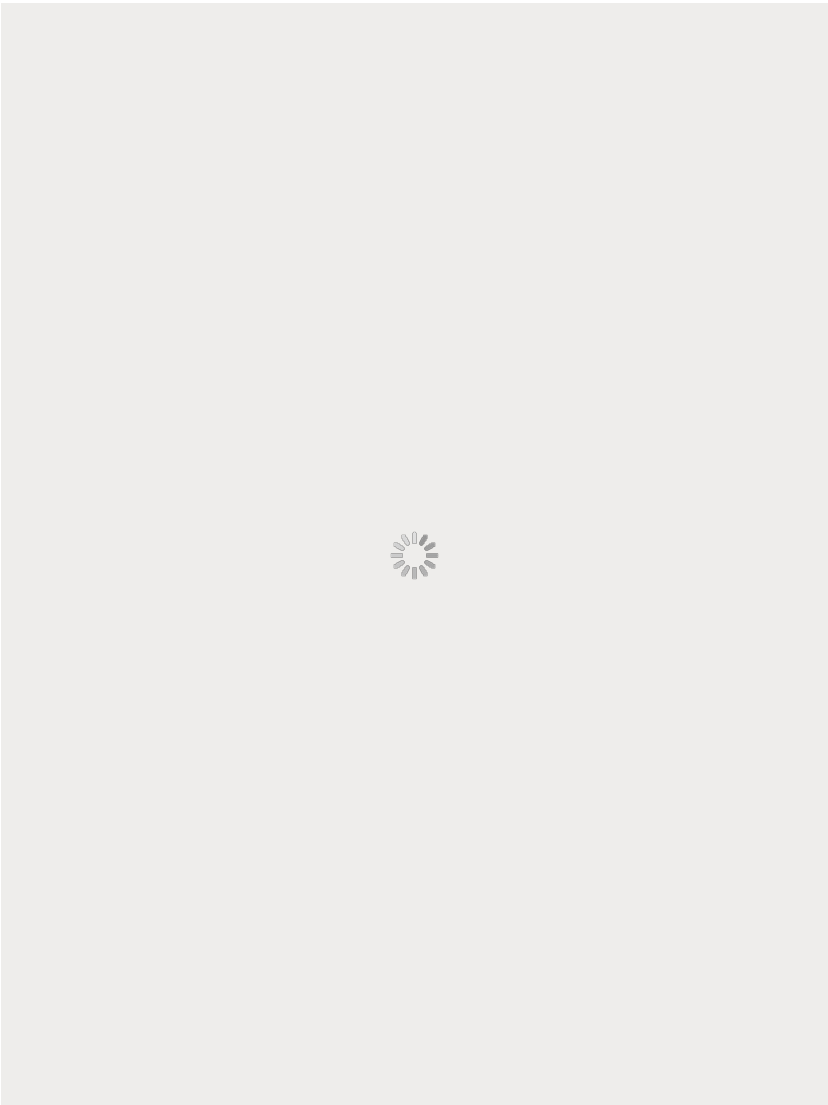
三联生活周刊

个人微博：@kottabo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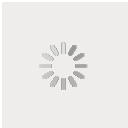


驳静

返京人员进小区困难者请与我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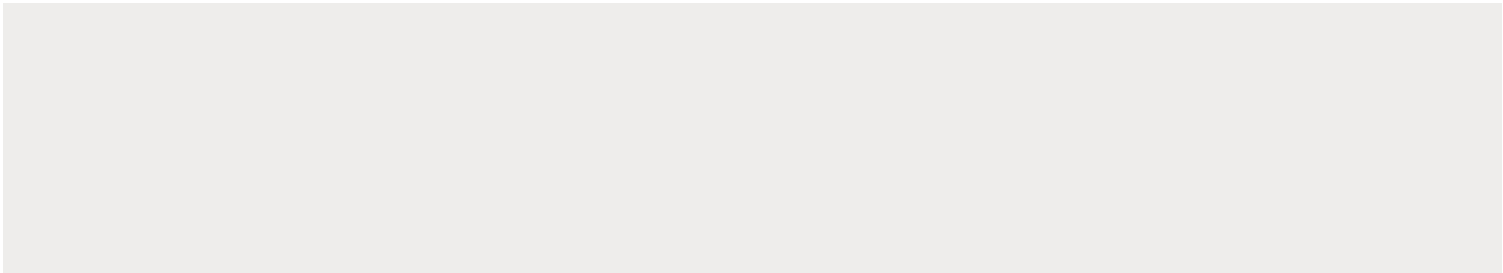
26分钟前



三联生活周刊

个人微博、豆瓣都是：驳静

请戳→【武汉新型肺炎系列报道】



⊙ 文章版权归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所有，**欢迎转发到朋友圈，转载开白请联系后台。未经同意，严禁转载至网站、APP等。**

文章已于2020-01-30修改

[阅读原文](#)